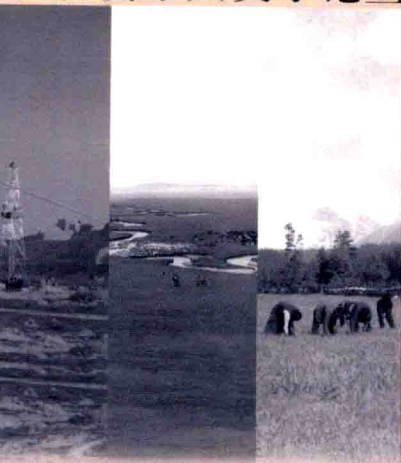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第22卷



中国 西部边区 发展模式 研究

主编 ◆ 潘乃谷 马戎

民族出版社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第22卷

中国西部边区发展模式研究

潘乃谷 马戎主编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洪宝 张运珍

装帧设计:刘家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西部边区发展模式研究/潘乃谷,马戎主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5

ISBN 7-105-04006-8

I. 中… II. ①潘…②马… III. ①西部大开发
(中国)-研究②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8246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375 字数:185 千字

印数:0001—1500 册 定价:12.5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学术指导：费孝通

主 任：马 戎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长江 马 戎 王铭铭

刘 能 刘世定 刘援朝

李建新 邱泽奇 周 星

赵旭东 赵 斌 高丙中

郭志刚 钱民辉 麻国庆

蔡 华 潘乃谷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书目

1. 《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

潘乃谷、马戎主编，邱泽奇、王铭铭执行主编，1996，天津人民出版社

2. 《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

周星、王铭铭主编，1997，天津人民出版社

3. 《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

王铭铭著，1997，天津人民出版社

4. 《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

王铭铭著，1997，天津人民出版社

5. 《象征与社会》

王铭铭、潘忠党主编，1997，天津人民出版社

6. 《现代化与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

高丙中主编，1997，天津人民出版社

7. 《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

马戎、周星主编，潘乃谷、王铭铭执行主编，1998，群言出版社

8. 《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

马戎编，1997，天津人民出版社

9. 《汉族的民俗宗教》

渡边欣雄著，周星译，1997，天津人民出版社

10. 《环境与社会》

(美)查尔斯·哈珀著，肖晨阳等译，1998，天津人民出版社

11. 《蒙古游牧社会的变迁》

- 色音著，1998，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2. 《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
潘乃穆等编，199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3.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
马戎、龙山主编，1999，福建教育出版社
14. 《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究》
马戎、龙山主编，2000，福建教育出版社
15. 《中国乡镇组织调查》
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2000，华夏出版社
16. 《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
马戎、刘世定主编，2000，华夏出版社
17. 《社会科学的应用与中国现代化》
乔健、李沛良、马戎主编，1999，北京大学出版社
18. 《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
马戎、周星主编，1999，北京大学出版社
19. 《中国民族社区发展研究》
马戎、周星主编，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
20. 《21 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北京大学国际学术系列讲座》
马戎、周星主编，王铭铭、高丙中副主编，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
21. 《21 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第三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讲演集》
马戎、周星主编，王铭铭、高丙中副主编，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
22. 《中国西部边区发展模式研究》
潘乃谷、马戎主编，2000，民族出版社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出版说明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是在费孝通教授主持下于 1985 年和 1987 年相继建立的,多年来一直在他的学术指导下进行教学、科研以及培养新一代社会学者的工作。费孝通教授一贯倡导认识中国社会必须深入到社会实践中去,从科学的调查研究入手。他本人身体力行,无论在选定命题、提出破题思路、理论指导、研究方法和学风等方面都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发展之路。

遵循社会学学科重建的方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密切联系中国实际,以学术研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过去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我们努力迈出了第一步。现在全国人民都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我国的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腾飞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上涌现出了大量的新现象需要我们去研究,出现了大量的新问题需要我们去分析,同时因学科一度中断,有许多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工作也需要我们不断进行补充与积累,继往开来,今后我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园地将越来越宽广,社会学人类学者的责任也将越来越沉重。任重而道远,只有奋发努力,再接再厉,才能使我们的学科建设适应中国改革发展新形势的要求。

为了学习和发扬以费孝通教授为代表的老一代社会学人类学

家的学术思想和踏踏实实的学风,也为了交流年轻一代学者的学术成果,我们汇集了自我所承担“七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以来的部分成果,编辑成《社会学人类学论丛》出版,自1989年至2000年共出版了22卷。今后这一个系列的丛书,将主要包括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密切相关的调查报告、区域发展研究、专题研究成果等等。这些成果不但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从事具体工作的人员,也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与此同时,我们还编辑出版了《社会学人类学译丛》和《社会与发展研究丛书》两套系列丛书,主要结合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从相关的学术理论、研究方法、重要专题研究等方面介绍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经典理论和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我们希望,这三套丛书的出版,将会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促进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并逐步创立扎根中国土地、具有中国文化与社会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学科。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2000年10月

导 言

潘乃谷 马 戎

一

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不断发展和沿海地区与西部边疆地区经济差距的迅速扩大，如何推动西部地区在经济上赶上去，就成为中央政府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同时这个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984 年，费孝通教授在考察了内蒙古赤峰地区和包头市之后，写下了《赤峰篇》和《包头篇》（费孝通，1987），明确提出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边区开发是一个与沿海地区发展同样重要的大问题，随后，边疆地区发展问题也就成为当时刚刚成立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两大研究领域之一。^①

在进入 21 世纪之后，根据全国社会经济形势的最新发展，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这既是沿海地区的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向内地和边疆地区的延伸，也是国家“扩大内需，拉动经济”战略在当前历史阶段最佳的选择。我国

^① 当时名称为社会学研究所，由费孝通教授于 1985 年创建并担任第一任所长，1992 年正式改名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在“七五”期间我所另一个研究领域是沿海小城镇发展研究。

辽阔的西部地区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但是资源分布很不均衡，基础设施十分薄弱，开发费用很高。当地居民中有很大比例为少数民族人口，他们的语言、宗教、生产传统和生活习惯与内地和沿海地区的居民存在差别，如何动员这些少数民族干部群众投身于“西部大开发”，使他们在这些活动中从各个方面进入现代化的进程，在社会组织、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得到迅速的发展，从而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目标，促进我国各个地区之间在社会、经济方面的整合，在“多元”的基础上达到“一体”的加强与繁荣，是我国在 21 世纪的重要历史任务。

我国沿海省份与内地和西部边疆在经济水平方面的差距，是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造成的。自从中央推行改革开放政策、重点进行经济建设之后，沿海省份及经济特区利用其在基础设施、地理便利、工业基础、较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传统优势，充分利用政府颁布的种种改革政策，发展起来了国有经济之外的乡镇企业和个体商业服务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增长，城市服务设施和人民收入普遍得到明显提高。

而在基础设施和工业基础等方面处于劣势的西部地区，长期以向国有经济提供农畜产品和矿产品等原材料为其主要经济活动。在改革初期，许多轻工业品由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生产，政府放开了对其市场价格的控制，这些轻工业品因供不应求价格上涨，推动了沿海经济的增长。而原材料仍然由政府部门统一收购并供应给国有企业，政府部门为降低国有企业生产成本长期控制原材料收购价格上涨，这样就使得“原材料—制成品”价格剪刀差由于体制原因一度拉大，使西部在经济上的劣势更为显著，这种迅速拉大的经济发展差距在西部地区的干部和民众中引起很大的不满情绪，由于西部地区以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为主，这种不满会导致民族之间的矛盾，从而引发文化宗教冲突和社会动荡，甚至危及国家的统一。所以西部的发展问题，决不仅仅是个地区之

间的经济差距问题，也是民族问题、政治问题。

前苏联因为各种因素于 90 年代初期正式解体之后，紧跟着又有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解体，西方政治家、新闻媒体与学术界，都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其中不少人也在期待着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解体。毋庸讳言，由于我国与前苏联在意识形态与民族政策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样面临着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等问题，存在着类似的各种内部矛盾，西方国家的这种期待的意图也是不言而喻的。在 80 年代，西方国家曾利用前苏联的改革和开放对它的政治解体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现在则希望利用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对中国各个少数民族群体施加它们在意识形态、宗教、文化、经济方面的影响，有些外国势力不满足于进行文化渗透和施加外交压力，甚至直接用金钱和武器支持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开展恐怖主义活动。我国内部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与外部国际政治环境等方面的变化使得对于西部发展问题的研究具有更为重要和紧迫的意义。

二

正是带着对民族团结和区域协调发展的这样一种深层次的关切，费孝通教授在 1985 年至 1990 年期间主持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七五”重点课题“边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研究”，并提出了研究的整体设想和基本思路，课题的具体调查与研究工作是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承担的。

自 1987 年至 1990 年期间，课题组先后在黑龙江、内蒙古、甘肃、新疆、四川、西藏等地区组织了一系列的实地专题调查，根据课题的整体设计，当时我们提出的主要研究专题有 13 个：(1) 人口迁移，(2) 民族关系，(3) 民族教育事业，(4) 资金引进，(5) 外来大企业的作用，(6) 商品流通与边境贸易，(7) 基

层经济组织与社区发展，(8) 小城镇发展，(9) 基础设施建设，(10) 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11) 人口增长与计划生育，(12) 国外影响与跨境民族，(13) 宗教与传统文化。这 13 个专题涉及到我国边疆地区发展中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以及影响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根据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地理位置进一步把我国主要边疆地区粗略地划分为 9 个不同类型的调查区域（潘乃谷、马戎，1993：8）。

这些研究专题的选定和调查区域的划分，只不过是对于“边区发展”这个大题目所做的宏观设计和研究设想，在“八五”期间，我们这支小小的研究队伍是绝对不可能完成这些调查与研究工作的。根据当时人员安排和调查时间等等具体条件，我们制定了第一批调查计划，课题组成员分赴选定的调查区域，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 9 篇专题研究论文，汇编成《边区开发论著》（潘乃谷、马戎主编）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 1993 年出版。这个课题的调查与研究，是我们研究所“边区发展”研究计划的第一个阶段。

“八五”规划期间，在潘乃谷教授主持下，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承担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和脱贫致富问题”。这一课题在研究领域上相对集中于资源生态的利用与保护、脱贫措施这两个方面，但是在分析一些特别贫困地区如何能够真正脱贫时，涉及到了保护生态资源、发展副业、转变思想观念、发展乡镇企业、发展民族教育、发挥民委作用等许多具体而丰富的内容。在 1992 年至 1994 年期间，课题组成员先后在内蒙古、甘肃、云南、贵州、湖南、海南等地区开展实地调查，共完成了 14 篇专题论文，汇集为《多民族地区：资源、贫困与发展》（潘乃谷、周星主编）一书，于 1995 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课题标志着我们研究所“边区发展”研究计划的第二个阶段。

另一个与西部发展和民族关系密切联系的课题，是由费孝通教授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八五”重点课题“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这个课题的设计要求在对少数民族基层社区的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形成与当前发展过程中有关的主要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这个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是对于全国一些主要少数民族基层社区（多以村落为单位）开展的基础性调查报告，汇集为《少数民族社区发展研究》一书，另一个成果是由课题组成员共同完成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学术专著，从历史、基本理论和主要专题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和当前各民族之间关系的主要领域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这两本著作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这个课题的内容，特别是少数民族社区发展部分，可以说是我们“边区发展”研究计划的第三个阶段。

在“九五”期间，由潘乃谷教授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又承担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侧重于研究我国西部的区域性发展模式。这个课题从许多方面看，都是前三个课题的延续，也可以说是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边区发展”研究计划的第四个阶段。在1996年至1998年期间，在过去调查积累的基础上，课题组对于我国西部3个最重要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新疆、西藏的经济发展再次开展了实地调查与专题研究，本书汇集的就是这一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下面简要地介绍一下这一课题的设计思路及本书的主要内容。

三

我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若以西北、西南行政区划来看，共包括西北陕、甘、宁、青、新5省区和西南滇、贵、川、桂、藏

5 省区，约占我国领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但是陕西和四川两省已经拥有一定面积的相对发达地区，就全省的范围讲不能算是“边区”，而属于华北边境地区的内蒙古自治区，从许多方面看仍应属于边疆不发达地区的范畴。所以谈到我国的“西部边区”，其范围应当包括内蒙古自治区，而不包括陕西和四川两省。

在我国现有的 5 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中，新疆、西藏和内蒙古是 3 个战略地位最为重要、又各自具有鲜明特点的 3 个自治区，位居我国西北、西南、北方三个方向的边疆地带，3 个自治区的国境线共有 1.4 万多公里，占我国陆地国境线的 70 %。在地处边疆、经济基础薄弱、民族宗教问题突出的各个少数民族区域当中，重点研究这 3 个自治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下面介绍一下这 3 个地区的基本情况和我们具体选题的考虑。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面积 160 多万平方公里，国境线 5700 公里，位居西北战略要地，远离内地，交通不便。主要民族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族等，1990 年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人口为 721 万，在我国各少数民族中人口规模位居第五位，占新疆人口的 47.5 %，汉族占 37.6 %。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许多居住在新疆，伊斯兰教的特点是宗教立国和武力传教，近年来“原教旨主义者”鼓吹“圣战”，在一些中亚国家扩大了势力。由于与中亚地理相连，新疆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和他们的宗教信仰与中亚和阿拉伯地区有着密切关系。

概括地说，距内地遥远、伊斯兰教影响、与中亚和阿拉伯地区的传统联系是新疆的三大特点。而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是我国西部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清朝末年以来，新疆便成为帝国主义势力企图分裂中国的重要舞台，新疆和平解放后依然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60 年

代初期出现过在境外势力煽动下数万少数民族边民外逃事件，在改革开放后许多人前往麦加朝觐，境外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借机利用宗教向新疆地区渗透，用金钱和武器资助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从事恐怖主义活动，危及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成为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的一个新的不稳定因素。

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中的实际作用上来看，历代皇朝针对新疆地区的三大特点而组织的“军事屯垦”和解放后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都在稳定局势、抵御外敌和发展生产几个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现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发展到 236 万人口，下属的 11 个师 188 个团场遍布新疆全境各个地区。前苏联解体后，新疆的外部环境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而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原有人员的年龄老化退休，兵团内部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兵团能不能稳定与发展，必将影响到整个新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我们认为兵团是当前新疆稳定和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基于这个认识，在新疆的调查中我们把重点放在对兵团的考察与分析。本书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模式”一章就是我们研究的初步成果。

2. 西藏自治区

面积为 120 多万平方公里，国境线 4000 多公里，1996 年总人口为 239 万，其中藏族占 96.3 %，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最高的一个地区。藏传佛教是藏族民众普遍信仰的宗教，历史上长期实行中世纪式的“政教合一”体制和农奴制，高原地理和崎岖的交通条件，也使西藏与内地的经济交往和人员交流十分困难。自元朝以来，中央政权主要依靠地方政府治理西藏，“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中央政府曾一度无法对西藏地区实行有效的管辖，1951 年签订《十七条协议》后，西藏和平解放，1959 年后又实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农奴制，目前流亡国外的达赖集团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仍然坚持分

裂祖国的立场，利用藏族民众的传统宗教感情和达赖的传统宗教地位，干扰西藏的正常宗教活动和经济建设事业。

概括地说，高原地理、藏族占人口绝大多数、历史上制度差异、宗教因素与达赖集团的干扰是西藏自治区的四大特点。

由于历史上宗教集团在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占据着核心地位，西藏的汉族人口规模很小，西藏在和平解放前属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西藏经济结构与发展也因此带有许多不同于任何其他地区的特殊性。针对这些特点，我们对西藏经济的研究首先是从历史与现实的基本经济结构入手加以分析，分析西藏经济的历史特点与现代特点，以及形成这些特点的各种原因。试图在经济结构变迁的分析中总结其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分析中央政权在西藏经济中所起的作用，研究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政府政策能够在哪些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在本书有关西藏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报告中，以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经济关系演变的理论模式为考察视角，探讨今天西藏地区的经济是否已经作为一个有机的部分真正融入全国经济体系。

3. 内蒙古自治区

面积为118.3万平方公里，国境线4221公里。蒙古族在我国各少数民族中，人口规模居第8位，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总人口为480万，其中蒙古族为15.8%，汉族80.6%，是一个以汉族为大多数的自治区。许多居住在南部农业区的蒙古族在文化习俗上已经与汉族没有明显区别，从事传统畜牧业的蒙古族牧民主要居住在与蒙古国接壤的北部草原牧区。

由于地理位置临近中原，蒙古族与汉族的交往历史悠久，特别是清朝末年实行的“移民实边”和放垦政策，吸引了华北受灾地区的大量汉族农民移居内蒙古，后中央政府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地域上设立了几个直接管辖的行省（热河、绥远、察哈尔），

1949年内蒙古的汉族人口从100万增至530万。内蒙古各个地区都与汉族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进行着广泛的交往。

内蒙古在漫长的国境线上与蒙古国相邻。内蒙古与蒙古国在族源、语言、宗教、生活习俗各个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目前内蒙古地区的经济水平和边民的收入与消费都明显高于蒙古国。内蒙古已经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而蒙古国由于长期以来靠前苏联的供应，产业结构仍处于调整期间，蒙古国需要内蒙古的工业品的供给，天津塘沽是其最近的出海港口，这是当前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在与蒙古国发展经济关系方面所拥有的优势。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中就有蒙古族，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陕甘宁边区与内蒙古相邻，延安民族学院培养了大批蒙古族干部，这些经过多年革命战火考验的干部，忠诚党的事业，维护祖国统一，成为解放后内蒙古自治区干部的主体。

概括地说，与汉族地区相邻和汉族人口比重大、存在内蒙古与蒙古国关系问题、较强的民族干部队伍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三大特点。

与我国其他省区相比，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发展总的来说还是比较落后的，分析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状况、经济基础和发展的外部条件，制定因地制宜的区域性发展模式，是内蒙古进一步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关键。在这个课题的计划内，我们在内蒙古自治区选定了三个研究专题：

(1) 草原畜牧业的发展模式。草原畜牧业在内蒙古牧区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控制人口、保护草场和改良畜种。人口过多则对自然资源的压力太大，草场是养畜的载体，改良畜种可以在同样面积的草场上得到更多的经济收益，我们借助对东乌珠穆沁旗一个社区的分析，从草原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综合分析畜牧业发展的条件。